

文化出版社
花木蘭
出版

曾永義
主編

輯刊 研究 文學 古典

二編 第5冊

《文心雕龍·時序》研究

呂立德著



古典文學研究輯刊

二 編

曾 永 義 主 編

第 5 冊

《文心雕龍·時序》研究

呂 立 德 著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文心雕龍·時序》研究／呂立德 著 — 初版 — 新北市：花木
蘭文化出版社，2011〔民100〕

目 2+168 面：19×26 公分

(古典文學研究輯刊 二編：第5冊)

ISBN：978-986-254-492-1 (精裝)

1. 文心雕龍 2. 研究考訂

820.8

100000956

ISBN-978-986-254-492-1



古典文學研究輯刊
二編 第五冊

ISBN：978-986-254-492-1

《文心雕龍·時序》研究

作 者 呂立德

主 編 曾永義

總編輯 杜潔祥

出 版 花木蘭文化出版社

發 行 所 花木蘭文化出版社

發 行 人 高小娟

聯絡地址 新北市永和區中正路五九五號七樓之三

電話：02-2923-1455／傳真：02-2923-1452

網 址 <http://www.huamulan.tw> 信箱 sut81518@ms59.hinet.net

印 刷 普羅文化出版廣告事業

初 版 2011年3月

定 價 二編 30冊 (精裝) 新台幣 48,000元

版權所有·請勿翻印

《文心雕龍·時序》研究

呂立德 著

作者簡介

呂立德，1963年生，臺灣澎湖七美人，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文學博士。作者於就讀高雄師範大學國文研究所碩士班期間，師事王更生教授，撰成「《文心雕龍·時序篇》研究」；攻讀臺灣師範大學國文研究所博士班期間，師事張高評教授，撰成「林琴南古文理論研究」。曾任正修科技大學講師、副教授兼教學發展中心主任，現任正修科技大學副教授兼通識教育中心主任，主要研究領域為古文學與古典文學理論。作者另主編《大學國文選》（2007，三民），並參與編著《實用中文》（2010，三民）。

提 要

一、研究目的

《文心雕龍》為一部首尾圓合，條貫統序之文論鉅著。其文評論諸篇，崇替褒貶，揚推古今，為《文心》批評之總薈。尤以〈時序〉一篇，論述文學與時代背景之關係，精到深刻，具體完備，足為後世治文學史者所取法。故矢志研究其義蘊，以宏揚彥和文論之幽光。

二、研究方法

首明〈時序〉命篇之旨意，以為進入正文前之認識與定位。次深入原典，分析其蘊藉之精義，並歸納組合，進行創作。於原典之探究中，再聯繫《文心》他篇及史籍所論，互相生發，比類論證。如此則彥和之論，可得而明矣。

三、研究內容

本論文凡分六章，茲依序撮述其大要：

首章曰「緒論」，敘述撰寫本文之動機、〈時序〉名篇之意旨，及彥和對前人理論承繼與創新之大較。

次章曰「文變染乎世情」，論述帝王愛好、政治隆污、社會治亂、學術思想影響文變之梗概。

三章曰「興廢繫乎時序」，言唐虞以迄劉宋，因時代嬗遞而造成各代文學興廢之真象。

四章曰「由本篇觀劉勰對時君之論評」，探討彥和對時君之評論，其方式又採單論、合論、缺而不論之例進行。

五章曰「由本篇觀劉勰《文心》成書之時間」，分「成書於齊末」、「撰於齊、成於梁」、「撰於梁、成於梁」三說，並覈之本篇之文字，稽求考證，以論「成書於齊末」說之可信。

六章曰「結論」，說明本篇於《文心》批評論中之地位，及其對後世文論之影響，文末更指明本文研究之成果。

四、研究結果

經由本文逐章之剖析探究，有關〈時序〉之義蘊，已多所抉發。而彥和對文學與時代相激相盪之論，及其衣被後世者，亦至深且鉅。至其所涉及成書時間，對後世學術界造成是非兩可之論戰，而迄今不休。



目 次

第一章 緒 論	1
一、撰寫本文之動機	1
二、「時序」之意義與篇旨	2
三、前人有關文學與時代背景關係之理論	3
第二章 文變染乎世情	7
一、帝王愛好與文變	7
二、政治隆污與文變	15
三、社會治亂與文變	17
四、學術思想與文變	18
五、結 語	22
第三章 興廢繫乎時序	25
一、唐虞、三代之歌謠吟詠	25
二、戰國散文與屈騷並馳	29
三、兩漢辭賦之大盛	32
四、建安、正始五言騰躍	37
五、晉、宋詩壇之澹新	40
六、結 語	46
第四章 由本篇觀劉勰對時君之論評	47
一、單論一君者	47
二、合論數君者	52

三、缺而不論者	56
四、結語	58
第五章 由本篇觀劉勰《文心》成書之時間	59
一、成書於齊末	59
二、撰於齊、成於梁	68
三、撰於梁、成於梁	74
四、結語	78
第六章 結論	79
主要參考書目	85
書影：元至正乙未嘉禾本《文心雕龍·時序》	91
附錄一 蘇軾〈水龍吟·次韻章質夫楊花詞〉試析	101
附錄二 林紓的詩歌理論	113
附錄三 林琴南與桐城派	127
附錄四 林琴南論古文意境	157

第一章 緒 論

一、撰寫本文之動機

魏晉南北朝，政治陵替，內亂紛乘，朝代之更易有如弈棋。其間文風蔚起，眾說雜陳，詮次文體，品藻文采之作日增，曹丕《典論·論文》叩其端，曹植〈與楊德祖書〉、應瑒〈文質論〉、陸機〈文賦〉、摯虞〈文章流別論〉、李充〈翰林論〉。或臧否當時之才；或銓品前修之文；或泛舉雅俗之旨；或撮篇章之意，先後間出，各擅勝場。惟文多單篇，且略此詳彼，莫觀全貌。彥和不滿鮮觀衢路之作，故著《文心雕龍》，其流風餘韻，鍾毓千載。《四庫全書總目詩文評類序》云：

文章莫盛於兩漢，渾渾灑灑，文法成立，無格律之可拘。建安黃初，體裁漸備，故論文之說出焉。《典論》其首也。其勒為一書，傳於今者，則斷自劉勰、鍾嶸。勰究文體之源流，而評其工拙；嶸第作者之甲乙、而溯厥師承。

彥和辨章文體，評衡才士，自成一家之言。據〈序志〉所言《文心雕龍》文論體系，卷一〈原道〉、〈徵聖〉、〈宗經〉、〈正緯〉、〈辨騷〉等五篇為文之樞紐，乃其「文學本原論」；由卷二〈明詩〉，至卷五〈書記〉，論文敘筆，乃其「文學體裁論」；由卷六〈神思〉，至卷九〈總術〉，剖情析采，乃其「文學創作論」；由卷九末篇之〈時序〉，及卷十之〈物色〉、〈才略〉、〈知音〉、〈程器〉等五篇，崇替褒貶，揚摧古今，乃其「文學批評論」；另有〈序志〉一篇，闡明著述體例與旨趣，乃全書之「緒論」。全書組織綿密，條理井然，可謂體大慮周，籠罩羣言，後世之言文論者，莫不取以為法。

自結緣《文心》，既讚歎其文辭之美，亦欽服其銓次文體，揚摧古今，品藻得失之真知灼見。朝溫夕誦，領會文意，日久則愛不忍釋，遂立下研究之宏願，冀闡揚彥和之文論。

余少好辭章，尤嗜文評。《文心》一書，無一篇非關乎文評，其中尤以〈時序〉、〈物色〉、〈才略〉、〈知音〉、〈程器〉等五篇，評論今古，詮衡才士，其理論足為今日文學批評之借鏡也。五篇之中，尤以〈時序〉一篇，闡述文學與時代背景之關係，足見彥和之宏識卓見。蓋時代之推移，文風必隨之而變，其論足為後世治文學史者所法。然遍索歷來研究〈時序〉之專著與篇章，卻寥若晨星，因而不揣譾陋，專研〈時序〉，深入其骨髓，探究其義蘊，冀彥和之文論，重光於今日。

二、「時序」之意義與篇旨

「時序」一詞之意義，首見於《史記卷六十九蘇秦傳論》，其云：

吾故列其行事，次其時序，毋令獨蒙惡聲焉。

此處「行事」乃意謂生平之事蹟，與「時序」謂年代之次序對舉，故此處「時序」，乃謂時年之先後。又《文選·陸士衡贈尚書郎顏彥先詩》云：

淒風迺時序，苦雨遂成霖。

據李善注引「《莊子》曰：『陰陽四時運行，各得其序。』」可知此「時序」意謂時節之更迭。至於劉彥和《文心雕龍》，不僅以「時序」命篇，且篇中復云：

文變染乎世情，興廢繫乎時序，原始以要終，雖百世可知也。

此處「世情」與「時序」相對成文。「世情」意謂當世之社會情狀；「時序」則謂時代先後之順序，換言之，即指時世之變遷，其意與「時運」相通。

綜上所述，則「時序」一詞凡有三解：一曰時年之先後；二曰時節之更迭；三曰時世之變遷。而彥和《文心·時序》蓋採用第三義，以闡述文學與時代背景之關係，擴展「時序」意義與範疇。

彥和之所以立〈時序〉，據〈序志〉云：「崇替於時序」，言以時序檢論歷代世運，關繫文學風尚之盛衰流變也。蓋時運與文變相會，成其遷變之序，即指文運之升降也。文運固主於時，亦兼會於世，世必隨時而移，時亦與世相融合，始成文學高下興衰之數。

〈時序〉之篇旨究竟為何？彥和以為時代之變遷，政治之嬗變，勢必左右作家之情感與文學之高下盛衰，故以「文變染乎世情，興廢繫乎時序」立

論，即以世情決文風之變遷，以時序繫文學之興衰。而篇中有言及帝王之愛好與提倡文學者；言及政治之隆污者；言及社會之治亂者；言及學術思想之面貌者，彥和皆以爲染乎世勢，文變迭生。

篇中又有所謂：「蔚映十代，辭采九變。」即以朝代爲文變之綱領，以文變定朝之分合。蓋以朝代之次序，分論各代文變之大較，然文風之變，或有不與朝代相始終，嘗有一代前後攸異者；有數代文風略同者。彥和標舉十代九變，蓋欲從歷代朝政世風之盛衰，以示文變之要領也。

三、前人有關文學與時代背景關係之理論

彥和於〈時序〉論述文學與時代背景之關係，其理論實前有所承，如先秦時期之孔子，首言文學與時代之接合。《論語·陽貨》曰：

小子何莫學夫詩？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羣、可以怨。邇之事父，遠之事君，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

朱熹注言「興」謂感發志意；「觀」謂考見得失；「羣」謂和而不流；「怨」謂怨而不怒，四者正是文學作品體現當代社會環境與時代風尚之最佳詮釋。孟子繼孔子之後，有更具體之理論，《孟子·萬章》有云：

誦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論其世也，是尚友也。

孟子乃從讀書之角度，指陳出誦詩、讀書首以「知人」爲基，即識其作者，進而更須認識作者之時代環境，探究作品與作者之社會歷史關係。《左傳·襄公二十九年》嘗載吳公子季札於魯國觀周樂，〔註1〕依次聆聽〈國風〉、〈雅〉及〈頌〉，論及各國之成敗興衰，即爲探討時代與詩關係之具體評論。《禮記·樂記》更闡揚《左傳》之論述，其云：

凡音者，生人心者也。情動於中，故形於聲，聲成文，謂之音。是故治世之音，安以樂，其政和。亂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國之音，哀以思，其民困。聲音之道與政通矣。

此乃闡述音樂之情調與當代政治之盛衰隆污互爲因果，故以詩樂反映時代治亂與政治之盛衰，爲當時之風尚。荀子亦有同《禮記·樂記》之說，其〈樂論〉云：

亂世之徵，其服組，其容婦，其俗淫，其志利，其行雜，其聲樂險，

〔註1〕 見《左傳·襄公二十九年》，其云：「吳公子札來聘……，盛德之所同也。」茲以文長，故不錄。

其文章匿而采。其養生無度，其送死瘠墨，賤禮義而貴勇力，貧則爲盜，富則爲賊，治世反是也。

荀子舉出亂世之徵，於聲樂之「險」，於文章之「匿而采」，此乃闡明當時代衰亂，則音樂、文章皆會受其左右而風氣敗壞。

兩漢時期之《毛詩序》，是先秦詩樂理論之總結，〔註2〕序云：

情發於聲，聲成文，謂之音。治世之音，安以樂，其政和。亂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國之音，哀以思，其民困。故正得失，動天地，感鬼神，莫近於詩。先王以是經夫婦，成孝敬，厚人倫，美教化，移風俗。故詩有六義焉，一曰風；二曰賦；三曰比；四曰興；五曰雅；六曰頌。上以風化下，下以風刺上，主文而譎諫，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故曰風。至於王道衰，禮義廢，政教失，國異政，家殊俗，而變風變雅作矣。

此全面性強調文學之社會作用，揭示不同時代之政治、道德、風俗、音樂與詩歌之攸關。其後楊雄《法言·孝至》亦云：

或問：泰和？曰：其在唐虞成周乎？觀《書》及《詩》，溫溫乎其和可知也。周康之時，頌聲作乎下，〈關雎〉作乎上，習治也。齊桓之時，而《春秋》美邵陵，習亂也。故習治，則傷始亂也；習亂，則好始治也。

此乃論述文學作品必須具有反映社會生活之作用。王充於《論衡·對作》亦有類此之言論，其言云：

是故周道不弊，則民不文薄；民不文薄，《春秋》不作。楊墨之學，不亂傳義，則孟子之傳不造；韓國不小弱，法度不壞廢，則韓非之書不爲；高祖不辨得天下，馬上之計未轉，則陸賈之語不奏；眾事不失實，凡論不壞亂，則桓譚之論不起。故夫賢聖之興文也，起事不空爲，因書不妄作，作有益於化，化有補於正。

此由文學反映時代政治之角度，論述文學與時代之關係。班固於《漢書·藝文志·詩賦略論》云：

自孝武立樂府而采歌謠，於是有代趙之謳，秦楚之風，皆感於哀樂，緣事而發，亦可以觀風俗，知薄厚云。

〔註2〕《毛詩序》之作者，至今尚無定論，而其論實爲前代詩樂理論之總結，故列於此，便於敘述。

班氏以爲詩歌乃描寫社會現實，故其內容亦應隨社會現實而變。

魏晉南北朝時期之謝靈運，在其〈擬魏太子鄴中集詩八首〉中，嘗予前代作家如王粲、徐幹、陳琳、應瑒等之作品加以評論，〔註3〕可見謝靈運已體認社會狀況、作家際遇與其作品關係之密切。沈約《宋書·謝靈運傳論》有云：

自漢至魏，四百餘年，辭人才子，文體三變。相如巧爲形似之言；班固長於情理之說；子建、仲宣以氣質爲體，並標能擅美，獨映當時。是以一世之士，各相慕習，源其飄流所始，莫不同祖風騷，徒以賞好異情，故意制相詭。降及元康，潘、陸特秀，律異班、賈，體變曹、王。縉旨星稠，繁文綺合，綴平台之逸響，采南皮之高韻。遺風餘烈，事極江右。有晉中興，玄風獨振；爲學窮於柱下，博物止乎七篇；馳騁文辭，義殫乎此。

其論歷代詩賦之繼承關係，並言及道家之玄風對文學之影響。

彥和於〈時序〉探討文學與時代背景之關係，其中就政治隆污、時君提倡、社會治亂、學術思想等方面，闡述各代文變之梗概。其理論雖多所承襲，但前人文論，多屬隻言片語，獨彥和之作，架構完整，獨樹一格，不僅前人之所不及就，亦爲後世所不可無也。

〔註3〕謝靈運〈擬魏太子鄴中集詩八首〉中評王粲云：「家本秦川貴公子孫，遭亂流寓，自傷情多。」評徐幹云：「少無官情，有箕穎之心事，故任世多素辭。」評陳琳云：「袁本初書記之士，故述喪亂事多。」評應瑒云：「汝穎之士，流離世故，頗有飄薄之嘆。」見《文選》卷三十。

第二章 文變染乎世情

彥和於〈時序〉云：「文變染乎世情」，言文風之流變必受世情之感染。而所謂「世情」究指何事？根據〈時序〉之析論，可知為帝王之愛好、政治之隆污、社會之治亂、學術思想諸端，其皆足以影響人心，致生文變。茲依序論述其影響文變之梗概，以見彥和之用心。

一、帝王愛好與文變

〈時序〉對帝王於文學之態度，多所著墨，如帝王本身參與創作，並積極提倡與拔擢文才，而蔚為風氣，影響至為深遠。如彥和論戰代齊、楚兩國君主尚文，〈時序〉云：

春秋以後，角戰英雄，六經泥蟠，百家飄駭。方是時也，韓魏力政，燕趙任權，五蠹六蟲，嚴於秦令，唯齊、楚兩國，頗有文學。齊開莊衢之第，楚廣蘭臺之宮，孟軻賓館，荀卿宰邑，故稷下扇其清風，蘭陵鬱其茂俗，鄒子以談天飛譽，騶奭以雕龍馳響。屏平聯藻於日月，宋玉交彩於風雲。

蓋以戰國時期，羣雄爭霸，或致力征伐，或任用權謀，唯齊、楚兩國之君崇尚才士，頗有文學。如齊宣王開府第於大道之旁，以延攬學人；楚襄王廣蘭台之宮室，以接待文士。以至產生孟軻、荀卿、鄒衍、騶奭、屈原、宋玉等傑出作家。關於齊宣王好文延才之盛事，《史記·孟子荀卿列傳》嘗云：

騶奭者，齊諸騶子，亦頗采騶衍之術以紀文，於是齊王嘉之，自如淳于髡以下皆命曰列大夫，為開第康莊之衢，高門大屋尊寵之，覽天下諸侯賓客，言齊能致天下賢士也。

《史記·田敬仲世家》亦云：

宣王喜文學，游說之士，自如鄒衍，淳于髡，田駢、接子、慎到、環淵之徒七十六，皆賜列第，爲上大夫，不治而議論，是以齊稷下學士大盛，且數百人。

又《孟子·公孫丑下》趙岐注云：

孟子雖仕齊，處師賓之位，以道見敬。王欲見之，先朝，使人往謂孟子云：寡人如就見者，若言就孟子之館相見也。

由上可知，齊宣王既喜愛文學，且極力延致天下學人於稷下。^{〔註1〕}至於楚襄王之接待文士，如《文選·風賦》有云：

楚襄王游於蘭台之宮，宋玉、景差侍。

蓋由於齊、楚兩國君主之拔擢才人，廣交文士，躋於七強之列，文學尤盛一時。而作家間出，爲同期他國所不及也。

漢至武帝，從董仲舒議，立《五經》博士，開弟子員，設科射策，勸以官祿，定儒術於一尊，罷黜百家，以立儒家之正統。更提倡文學，雅愛辭賦，嘗讀相如〈子虛〉，恨不與之同時，又以安車蒲輪徵枚乘，束帛加璧徵魯申，召朱買臣說《春秋》、《楚辭》，於是賦家畢集中央。彬彬之盛，大備於時矣。〈時序〉云：

逮孝武崇儒，潤色鴻業，禮樂爭輝，辭藻競驚。柏梁展朝讌之詩，金隄製恤民之詠，徵枚乘以蒲輪，申主父以鼎食，擢公孫之對策，嘆倪寬之擬奏，買臣負薪而衣錦，相如滌器而被繡。於是史遷、壽王之徒，嚴、終、枚皋之屬，應對固無方，篇章亦不匱，遺風餘采，莫與比盛。

蓋武帝不僅本身能聯句、賦詩，且拔擢文士，如枚乘、主父偃、公孫弘、倪寬、朱買臣、司馬相如等皆以辭賦得官，故大批俊才齊聚朝廷，文學盛況，蔚爲空前。《漢書·武帝紀贊》嘗論漢武帝提倡文學云：

孝武初立，表章六經，興太學，號令文章，煥焉可述。後嗣得遵洪業，而有三代之風。

武帝之尊儒崇經，影響後世甚巨。迄至東漢，崇儒之風所以更熾，或皆由乎

〔註1〕《史記·孟子荀卿列傳》云：「自鄒衍與齊之稷下先生，如淳于髡、慎到、環淵、接子、田駢、騶奭之徒，各著書言治亂之事，以干世主，豈可勝道哉！」司馬貞索隱云：「稷，齊之城門也，謂齊之學士集于稷門之下也。」

此也。班固〈兩都賦序〉不亦云乎：

至於武宣之世，乃崇禮官，考文章，內設金馬，石渠之署，外興樂府、協律之事，以興廢繼絕，潤色宏業。

此言武、宣二帝提倡文學不遺餘力。《古文苑》卷八論及武帝詔羣臣作〈柏梁台詩〉云：

武帝元封三年，作柏梁台，詔羣臣二千石有能爲七言詩，乃得上座。

武帝之禮遇文士，由此可見。《史記·儒林傳》亦嘗論武帝延致文學儒士云：

及今上即位，趙綰、王臧之屬，明儒學，而上亦鄉之。及竇太后崩，武安侯田蚡爲丞相，絀黃老刑名百家之言，延文學儒者數百人，令禮官勸學講議，洽聞興禮，以爲天下先。

班固《漢書·公孫弘、卜式、兒寬傳》亦嘗稱武帝兼重文學武藝，招納人才，贊云：

公孫弘、卜式、兒寬皆以鴻漸之翼，因於燕爵，遠跡羊豕之間，非遇其時，焉能致此位乎？是時漢興六十餘載，海內艾安，府庫充實，而四夷未賓，制度多闕，上方欲用文武求之如弗及，始以蒲輪迎枚生，見主父而歎息，羣士慕嚮，異人並出，卜式拔於芻牧，弘羊擢於賈豎，衛青奮於奴僕，日磾出於降虜，斯亦曩時版築飯牛之明已，漢之得人，於茲爲盛。儒雅則公孫弘、董仲舒、兒寬；篤行則石建、石慶；質直則汲黯、卜式；推賢則韓安國、鄭當時；定令則趙禹、張湯；文章則司馬遷、相如；滑稽則東方朔、枚臯；應對則嚴助、朱買臣；歷數則唐都、洛下閎；協律則李延年；運籌則桑弘羊；奉使則張騫、蘇武；將率則衛青、霍去病；受遺則霍光、金日磾，其餘不可勝紀，是以興造功業，制度遺文，後世莫及。

由以上史實觀之，武帝身爲帝王，提供文學，致君主倡於上，文人和於下，遂有「禮樂爭輝、辭藻競驚」、「餘風遺采，莫與比盛」之盛況。武帝以後之宣帝，踵武帝崇儒右文之績，〈時序〉云：

越昭及宣，實繼武績，馳騁石渠，暇豫文會，集雕篆之軼材，發綺縠之高喻。於是王褒之倫，底祿待詔。

宣帝嘗詔集羣儒於石渠閣，論定五經異同，並親臨制決；又於國家閒暇之時，聚文士講藝；更召雕琢辭賦之俊才，若王褒、劉向等人，皆以文章求致官祿，並待詔賦詠。如《漢書·宣帝紀》甘露三年嘗論宣帝詔羣儒以論五經同異，

並親臨制決之事云：

詔諸儒講五經同異，太子太傅蕭望之等平奏其議，上親稱制臨決焉。
迺立梁邱《易》、大小夏侯《尚書》、穀梁《春秋》博士。

又《漢書·王褒傳》云：

宣帝時，修武帝故事，講論《六藝》羣書，博盡奇異之好。徵能為《楚辭》九江被公，召見誦讀，益召高材劉向、張子僑、華龍、柳褒等，待詔金馬門。上頗作歌詩，欲興協律之事。……益州刺史因奏褒有軼材。上迺徵褒。既至，詔褒為〈聖主得賢臣頌〉。上令褒與張子僑等並待詔，數從褒等放獵。所幸宮館，輒為歌頌。第其高下，以差賜帛。

《後漢書·楊終傳》亦論宣帝徵諸儒論定五經之事云：

宣帝博徵羣儒，論定五經於石渠閣。

宣帝對於文學之愛好與提帝，致俊才文士得以待詔以創作文學。逮至元、成二帝，皆留意圖籍，獎掖文士。〈時序〉云：

自元暨成，降意圖籍，美玉屑之譚，清金馬之路，子雲銳思於千首，子政讎校於《六藝》，亦已美矣。

蓋元、成二帝既獎掖諸子百家之說，復清除文士待詔金馬之阻礙，遂有楊雄讀賦千首，文思銳敏；劉向整理前人之文化遺產，校讎《六藝》。^{〔註2〕}至於元帝崇儒右文之事，《漢書·元帝紀贊》云：

元帝多材藝，善史書，少而好儒，及即位，徵用儒生，委之以政。

言元帝既自負文史之才，並拔擢儒士，使之從政。而成帝亦有好文之盛事，如《漢書·成帝紀》云：「成帝好經書」。〈成帝紀贊〉又云：

博覽古今，容受直辭，公卿稱職，奏議可述，遭世承平，上下和睦。

蓋成帝除雅好經書外，復能博覽古今，察納雅言，故君臣和睦，上下一心。

有漢一代，由於帝王之愛好與提倡，致文士齊聚朝廷，競相創作，造成辭賦之盛況，一躍而為西漢文學之主流。是以帝王之愛好與提倡文學，實居其重要因素。至於漢高祖尚武鄙文，戲儒簡學，^{〔註3〕}故此期之文士未能齊聚。

〔註2〕 《漢書·藝文志》云：「至成帝時，以書頗散亡，使謁者陳農求遺書於天下，詔光祿大夫劉向校經傳諸子詩賦。……會向卒，哀帝復使向子侍中奉車都尉歆卒父業。歆於是總羣書而奏其《七略》，故有《輯略》，有《六藝略》，有《諸子略》，有《詩賦略》，有《兵書略》，有《術數略》，有《方技略》。」

〔註3〕 《史記·酈食其傳》云：「沛公不好儒，諸客冠儒冠者，沛公輒解其冠，澠弱